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7

司马相如

龚克昌 苏瑞隆 著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06
:7

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司马相如

龚克昌 苏瑞隆 著 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司马相如/龚克昌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 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1926-8

I. 司… II. 龚… III. ①汉赋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②司马相如(前179~前118)—文学评论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3686 号

司 马 相 如

龚克昌 苏瑞隆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2 千字 印张: 3 1/8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王维良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王 颖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1926-8/I·1670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目 录

- 一、赋家青少年时代与蜀郡成都/1
- 二、入京为武骑常侍,到客游梁,作《子虚赋》/13
- 三、追求自由婚姻,作《美人赋》/21
- 四、语言侍从生活,作《天子游猎赋》、《谏猎疏》、《哀二世赋》、《大人赋》/31
- 五、出使西南夷,作《喻巴蜀檄》、《难蜀父老文》/43
- 六、免官家居,作《长门赋》/49
- 七、从郎官到孝文园令,为乐府写作诗赋,作《封禅书》/55
- 八、汉赋的奠基者/63
- 九、关于司马相如的生卒年问题/86
- 附录: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/90

一、赋家青少年时代与蜀郡成都

司马相如(公元前 172?—公元前 118 年),蜀郡成都(今四川成都)人,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赋家。他是汉赋的奠基者。他的赋左右了两汉四百年的赋坛,成为赋家们学习的榜样;对以后历代作家,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

但是,像司马相如这样一位继屈原之后的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,不是产生在中原,而是出现在僻居西南的蜀郡成都,令人感到万分惊异和不解。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,蜀郡原是一个很偏僻、封闭、原始、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地方,包括后来的蜀郡作家自己也这样看,如传为扬雄所写的《蜀王本纪》就说,蜀的祖先称王的有“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开明”,“是时人萌(通氓,也即民)椎髻左衽(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,前襟向左掩,不同于中原人前襟向右掩),不晓文字,未有礼乐”。开明氏治蜀,已经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的事了,这时中原文化科学已极发达,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,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盛况。可是蜀郡竟然还那么落后、那么

蒙昧无知。开明以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？《汉书·循吏传·文翁》说：“景帝末，（文翁）为蜀郡守，……见蜀地辟陋，有蛮夷风，……”到汉景帝末年（公元前156年景帝在位至公元前141年），司马相如已经近三十岁了，可是在班固等人的心目中，蜀郡的落后、蒙昧、野蛮状况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。如果情况果真如此，那么怎有可能产生像司马相如这样名冠全国的杰出赋家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为了企图比较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，有些人——譬如三国时蜀郡自己的文学家秦宓——就说：“蜀本无学士，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（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），还教吏民，于是蜀学比于齐鲁。”（《蜀志·秦宓传》）这就是说，蜀郡本来是中国大地文化上的空白点，只因为当时在那里当郡守的文翁派遣司马相如到中原去学习“七经”，学成后回乡教授弟子，蜀郡的文化才一下子提高上来，可以与儒家的故乡齐鲁一带媲美！当然，在秦宓的心目中，司马相如的文学修养也是到中原学习后才提高上去的。

可是秦宓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：

首先，是时间不对头，因为司马相如在文翁守蜀前就已做官了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提到：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就做了武骑常侍。但他不喜欢这个官职，而酷爱辞赋，可是汉景帝偏偏不喜欢辞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梁孝王进京来朝见景帝，跟着进京的有邹阳、枚乘、庄忌等一大批文士，相

如很喜欢他们,就托病辞去武骑常侍一职,而到梁孝王的门下去游学。对梁孝王带着一大批文士进京的这段历史,我们从《汉书·文三王传》推知,当发生在梁孝王参与平定七国叛乱以后,也即景帝前元七年至公元前150年那一次。这也就是说,在景帝当皇帝的前期阶段。可是这时文翁还未守蜀呢!他守郡是在景帝后期,所以相如根本不可能充当“郡县小吏”被文翁派遣东出学经。况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也未曾有相如充当“郡县小吏”的记载。

其次是生活经历不对头,文艺思想不对头。按秦宓的说法,司马相如被遣东出学“七经”,学成后又回蜀传授“七经”,并且一下子把蜀郡的文化儒术提高到像齐鲁一样的水平,这当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件,他简直是个大经师,是建设蜀郡文化的功臣,这样的事,司马迁是肯定不会不知道的,可他却没有写,有这可能吗?班固写《汉书》司马相如传,也基本上照抄司马迁的记叙。他在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为西汉二十七名经师立传,在《循吏列传》里对蜀郡守文翁倡导学经也大加赞赏,但对相如的活动却不沾一笔。他能这样无视司马相如的作为吗?不能。惟一可解释的是,秦宓的话纯属乌有子虚之事。再从《史记》相如本传所叙述的司马相如的活动经历看,他也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进行过类似传经的活动,他一下子就以富家子弟的身份而得到郎官,所谓“以赀为郎”,做景帝的武骑

常侍,紧接着就是到梁孝王的门下与诸生交游,梁孝王死后又立即回成都家居,不久就发生了所谓“窃妻”的事件,再后就为汉武帝作赋去了。他哪来的时间去从事治经传经的活动呢?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,司马相如死时,司马迁已二十八岁了,他的说法比起后司马相如三百多年的秦宓自然要可靠,我们不能轻信秦宓的话。

司马相如的文艺思想与儒家的文艺思想也大相径庭。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强调文艺的经世致用,为政治服务;在形式上注重崇真尚实,反对华饰。但司马相如却完全背道而驰,他的赋大都沉醉在文艺作品的娱乐作用上,并且为所欲为毫无节制地运用虚构夸张的笔法,写出文辞华丽至极的作品。也正由于他的赋与儒家的要求格格不入,所以千百年来才一直引起一些儒家信徒的批评,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汉兴,枚乘、司马相如,下及扬子云,竞为侈丽闳衍之词,没其风谏之义,是以扬子悔之。”司马相如等人一方面不注意作品的讽谏劝诫,另一方面又恣意骋腾文势,讲究华饰,所以当扬雄一旦转向推重儒经之后,他对自己早年从事的写作活动就表示了忏悔,他不再写赋了,他甚至回过头来狠批汉赋,鄙弃曾经被他推崇的乡、老前辈、著名赋家司马相如。可见司马相如是绝不可能让文翁送到中原去学经,更不可能从事一系列的讲经传经活动。

那么,司马相如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天才又是

从哪里学来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先破除上面扬雄、班固、秦宓等人所说的蜀郡文化落后、人民无知、风俗野蛮的谬论。这种看法，往往反映了古代中原人传统的观念，他们总以为只有中原先进文明，人们知书识礼，有文化，其他边远地区的人民都是愚昧无知、野蛮、不开化的。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。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，就偏偏不是生长在中原，而是生长在被当时人们斥为“南蛮”的楚国。事实证明当时楚国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。蜀郡也正是这样。这个地区的文化也绝不像扬雄等人所说的那么落后。相反，那里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，否则，也就不可能产生像司马相如这样当时在全国是无与伦比的赋家。现在，人们对巴蜀文化的发展有两种看法：一种以为它有自己独立的体系，与中原文化迥异。另一种以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基本相同，差异只是表现在一些方言俗语上。巴蜀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。我反对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观点，我想巴蜀文化早期当有自己比较明显的特点。李白《蜀道难》写道：“噫吁嚱！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……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缘。”蜀与中原之间有秦岭高山阻隔，在远古，人们是难于超越的。作为文学作品的《蜀道难》可能有夸张成分，但蜀道之难，却也是事实。晋朝蜀郡历史学家常

璩在《华阳国志》里说过一个故事：蜀王在汉中山谷打猎时，遇到秦惠王。秦惠王送给他一竹箱金子，蜀王回赠一些珍玩。但这些珍玩很快变成灰土，惠王很生气，可是群臣却向他祝贺说：天受我了，王将得到蜀的国土。惠王高兴了，凿了五头石牛，把金子倒在牛屁股后，说是石牛屙下来的。蜀王看了很眼红，派使者去求石牛。惠王当然很是痛快地答应了，蜀王就派五丁力士迎石牛。为了迎石牛，就修了一条路，这就给秦灭蜀提供了方便。以后惠王就“从石牛道伐蜀”，灭了蜀国。

这个故事带有神话传说色彩，但秦惠王灭蜀却是历史事实；用石牛拉金子来骗取蜀王修入蜀道路可能有虚构成分。但这个故事至少说明，秦伐蜀为修通崎岖险峻的道路的确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这也正可以证明，在秦惠王灭蜀以前，蜀与外界的联系是不可能很多的，它肯定有自己的发展史，这当中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发展史。

可是我们从司马相如的赋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司马相如的赋和他稍后的另一个蜀郡大赋家扬雄的赋，与中原地区著名赋家如枚乘、班固、张衡等的赋，他们所使用的思想材料、文字韵律，以及篇章结构等等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甚至连地方色彩也很难见到，更何况自成体系的文化呢！例如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赋家，他们所描述的对象，大都是大汉帝王们的宫室苑囿和帝王们的饮食玩乐等等。他们所表现的手法，大都是虚构夸

张的,词藻也都是相当华丽艰涩的,而且讲究韵律,注意气势。甚至连赋的结构格式,也多大同小异。总之,在司马相如赋篇上面,我们很难看到蜀郡固有的文化痕迹。这正可以说明,至迟到司马相如的时代,蜀郡的文化已极为发达,已可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,而根本不像扬雄、班固、秦宓等人所说的那样,是文翁派人到中原去学经,蜀郡的文化才好像在一夜之间提高起来的。

蜀郡的文化与中原融为一体而发展起来的过程,文献缺少记载,我们难以详知。但从蜀与中原接触的过程中,我们是可以推测出一些大概的情况来的。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回答的,因为这是司马相如这个大赋家出现的社会基础、时代背景。

首先我们要肯定蜀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,这里土地肥沃,气候温和,雨量充沛,人类很早就在这里休养生息。如 1951 年发现的“资阳人”化石,距今已有数万年以上的历史。旧石器、新石器时代的遗物,更是时有发现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说,“周失纲纪,蜀先称王”;“七国称王,杜宇称帝”。说明战国时蜀已具备了国家的规模,那里的社会前进步伐与中原大体一致。但只有在蜀与中原频繁接触以后,那里的文化才得以突飞猛进。公元前 475 年以后,蜀两次派使入秦。公元前 387 年,蜀攻秦,取南郑(今陕西汉中);公元前 377 年,蜀伐楚,取兹方(今湖北松滋县)。但从公元前 316 年起,蜀便被秦所灭了。蜀被灭后,秦移民万

户入蜀。秦昭王时,范雎把商鞅的新法推行于蜀。张若、李冰又相继守蜀。尤其是李冰,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守蜀时,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,从而大大促进了蜀郡农业生产的发展,可能使蜀郡发展成为比当时六国更进步的地区。后来,秦又一再迁人入蜀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说,“秦之迁人皆居蜀”。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注引如淳说:“秦法:有罪,迁徙之于蜀汉。”吕不韦有食客三千,吕不韦迁蜀忧惧自杀,他的门下食客也有许多因而随迁。宦官嫪毐被秦始皇处死后,“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司马相如的岳父祖籍就是赵国,秦破赵后,也把他們强迫迁到蜀郡去。在这些被迁徙的人们中,自然会有大量的知识分子。如吕不韦的门客中,有许多就是帮他撰《吕览》的文士。又如司马相如岳父的先辈入蜀时,别人都怕走远路,纷纷向押迁的官吏行贿,要求就近落户;但他夫妇却愿意就远。他们走到临邛时,看到那里产铁,即留下来铸铁,很快成为蜀郡最著名的富翁。又:“程郑,山东迁虏也,亦冶铸贾椎髻之民(指当时的西南夷),富埒卓氏,俱居临邛。”他们都被司马迁写到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上去。他们都是富商巨贾著名的实业家。试想,如果卓氏、程郑没有文化,他们能有这样的见地吗?他能经营自己那份上千人的大产业吗?而所有入蜀的这些文士、大产业家,和前面所说的像李冰这样的郡守,他们自然要把自己的文

化科学知识扩散到社会上去,从而促进了蜀郡科学文化的进步和提高。所以在蜀郡成就司马相如这样的大赋家是有迹可寻的,是有坚实深厚的社会基础的。并不是空穴来风,无迹可寻。

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说,司马相如“少时好读书,学击剑,故其亲名之曰犬子。相如既学,慕蔺相如之为人,更名相如”。这段话非常重要,可以窥见司马相如青少年时的志向、为人,很值得细细推敲。

大家都知道,蔺相如是一个敢于抗暴而又心胸开阔,能顾全大局,时时把国家放在心上的有识之士。据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记载,秦昭王得知赵惠文王获楚和氏璧,即向赵王提出,“愿以十五城请易璧”。赵王进退两难,“欲予秦,秦城恐不可得,徒见欺;欲勿予,即患秦兵之来”。蔺相如说,“臣愿奉璧往使,城入赵而璧留秦;城不入赵,臣请完璧归赵。”相如携璧入秦后,看出秦王根本没有拿城换璧的意思,即诡称“璧有瑕,请指示王”。秦王把璧交给他,“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,怒发上冲冠”。数说秦王之短,并声言:“大王必欲急臣,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!”秦王担心璧被碰碎,不敢强夺,蔺相如连夜派人把璧送回国。并告诉秦王:“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,赵岂敢留璧,而得罪于大王乎?”秦王当然不会真心拿十五城去换璧,只好罢手,把蔺相如放回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完璧归赵”。这事可看出蔺相如的智与

勇。后来，蔺相如又陪赵王到渑池（在今河南渑池县西十三里）去会秦王。秦王令赵王鼓瑟，并叫御史记下，某年某月，赵王为秦王鼓瑟，以示侮辱。蔺相如也趋前，令秦王击缶（盛酒的瓦器）。秦王不肯，蔺相如正告他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“左右欲刃相如，相如张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”秦王无奈，“为一击缶”。相如也让赵御史写道：某年某月，“秦王为赵王击缶”。始终保住赵国的尊严。这事可以看出蔺相如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。

由于蔺相如接连为国立功，被委为上卿，位在名将廉颇之上。廉颇以为：“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，而位居我上。”“且相如素贱人，我羞不忍为之下。”因而声称：“我见相如，必辱之。”但蔺相如却不同他照面，有一次见廉颇来，马上“引车避匿”。门人指责他胆子小。蔺相如说：“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，相如虽弩，独畏廉颇将军哉！顾吾念之，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”这里可以看出蔺相如顾全大局识大体，急国家之急的爱国思想。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追寻蔺相如的事迹，无非想说明，蔺相如对司马相如的影响实在太太，我们从司马相如的一些行踪中，都可以窥见蔺相如的影子，如后文将提到的司马相如北上长安时在成都城郊桥上的

题辞,如他两次不辱君命出使西南夷,如他不愿到汉武帝面前去献殷勤为武帝写诗作赋,而暗暗撰写《封禅书》——这在封建社会被认为只有大人物大手笔才有资格撰写的重要文章,……这些,都是他紧步蔺相如,胸怀大志,希冀为国家效劳的表现。(详见后)由此可见,他由犬子改名相如,是有深意的,这是表现他的大志,我们不可轻易放过。在这里,使我们联想到前面提到的司马相如学击剑。有人以为相如这一举止仅仅表现当时文人的一般习气,恐不尽然。这当与他慕蔺相如的为人有关,也当与他的政治抱负联系在一起,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发生在稍前于他生活的年代、而他肯定能够知道的唐雎不辱使命和荆轲刺秦王中得到启示。唐雎用剑威迫秦王(即后来的秦始皇),制止秦王企图霸占安陵君的封地安陵(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),相如当会知道,因为当时秦已灭蜀,这是发生在他的国家近代史上的大事。又如,比他晚生三十年左右的司马迁,尚能听到友人公孙季功、董生直接从秦王(即后来的秦始皇)的医生、荆轲刺秦王时用药囊掷荆轲,从而保住秦王一条命的夏无且那里听到有关荆轲刺秦王的故事,并核实《战国策·燕策》(后来编的书名)有关此事的记载。这事也是发生在司马相如所在国,他当然也能知道。而这两件发生在司马相如所在国近代史上的大事,都与击剑有关,一个是成功的事例,一个因剑术不精而失败。司马相如学击剑,从司马相如慕

蔺相如,司马相如后来所表现的为国立功立业的举止,我们不能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。只有这样,才不致湮没司马相如好读书,学击剑、慕蔺相如为人的丰富意蕴。

二、入京为武骑常侍,到客游梁,作《子虚赋》

由于相如的家境很富裕,因而给他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,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去读书练剑。到二十岁左右时,他已学完了先秦主要经籍,可以说是学富五车,而且练就了一手好文章,身体也很强壮,可以做官为国效劳了。按当时朝廷规定,有家产五百万钱以上的,可以做郎官;但得自备车马服饰到京师长安(今陕西西安),等候政府任用。这些条件相如都具备了。他极踌躇满志,准备做官去。这时约在景帝前元五年,即公元前152年,相如二十岁左右。

东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说:“蜀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,有送客观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,题市门:‘不乘赤车驷马,不过汝下。’”相如这个题辞,自然要夹杂着一些世俗的观念,如所谓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、青史留名等等。但在这种狭隘的观念中更深地隐含着其建功立业、报效朝廷(代表国家)的思想。这种例子在古代多得不可胜数。例如,项羽看到秦始皇游会稽,渡浙江,前呼后拥,好不威风,